

专题:毒品滥用(三篇)

学术主持人:陈小彪

主持人按语

2020年以来,人类被小小的新冠病毒搅得天翻地覆,直到今天依然看不到完全战胜病毒的迹象。疫情期间,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各种“闭城锁国”的隔离政策,结果犯罪机会大大减少,诸多类型的犯罪率显著下降。然而,研究却显示,毒品犯罪不降反升,成为犯罪领域的独特现象。鉴于此,我们组织了关于毒品滥用及其治理的一组文章,希望通过分析毒品滥用的深层次原因来寻找毒品犯罪预防的有效手段。最近十多年来,随着女性地位的改变,女性在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都在发生变化,女性的社会参与成都越来越高,但女性生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的自我主宰意识越来越强,因此,他们卷入吸毒漩涡的比例也在增加,滥用毒品的男女比例正在缩小,女性吸毒人群的增加使毒品滥用这个群体的更加庞大。毫无疑问,有需求就一定会市场,在毒品犯罪领域更是如此。因此,毒品犯罪的预防更需要从吸毒人群着手,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存处境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场域、朋辈交往,才能让他们脱离“毒圈”。不仅仅是毒品犯罪高发的云南应该如此,其他地方也应如此,笔者曾经访谈过的诸多戒毒对象都说过同样的话:我的生活在吸毒前就已经有很多问题,吸毒只是问题的一种,在我自己看来,这不过是问题多了点而已。而笔者在采访复吸人员的时候,他们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我前次吸的时候生活就出了问题,等我出去之后,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也没有办法解决,结果就又吸上了。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毒品滥用群体,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生活中的问题太多。当前,治理毒品滥用已经形成了很好经验,也有非常成熟的模式,但复吸却是个世界难题,笔者曾经跟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研究戒毒措施效果评估的专家讨论过,无论哪种手段,复吸率都非常之高,笔者也长期跟踪一个戒毒机构,结果发现他们自己觉得复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甚至有一位复吸者已经是第八次到戒毒机构来了。如果我们的毛发检测技术能够为降低复吸率提供简便且有效的渠道,将为全世界的毒品滥用预防做出重大贡献。

“吸毒是我自己的事” ——当代中国女性吸毒的娱乐化时代

张韵然¹, 刘建宏², 钟 华¹

(1.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 香港 999078; 2. 澳门大学, 中国 澳门 999077)

摘 要: 在过去二十年中, 中国女性新型毒品使用者的激增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研究基于社会控制理论、差别接触理论和毒品使用的正常化理论, 通过分析强戒所女性吸毒者的调查问卷发现: 较强的社会控制可以有效帮助女性降低吸毒频率, 差别接触理论并不能解释女性吸毒频率的差异, 新型毒品使用者的吸毒频率明显低于传统毒品使用者, 女性的自主意识和对毒品掌控感已成为影响其吸毒频率的重要因素。同时对中国的戒毒康复政策的改进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物质滥用; 女性吸毒; 中国; 犯罪与越轨行为

中图分类号: C91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541 (2021) 04-0016-10

近些年来, 新型毒品在中国社会迅速流行, 海洛因在毒品市场慢慢失去主导地位。直到上世纪末, 中国仍然是一个以滥用海洛因为主的社会。然而, 在 20 世纪 90 年代, 西方社会派对和舞会文化传入中国, 使得娱乐性毒品(比如 k 粉)在夜总会、舞厅等场合开始流行(Joe Laidler, 2005)。而且,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合成药品生产国之一, 合成药品数量丰富、价格低廉, 也为新型毒品的流行创造了便利条件(SCMP, 2017)。2004 年, 在册新型毒品使用者 10.83 万人, 仅占有在册吸毒人员的 9.5%(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 2004)。然而在 2016 年底, 这一数字达到 151.5 万, 在所有在册吸毒人员中占比达到 60.5%(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 2017)。

毒品滥用行为一直是犯罪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霍华德·贝克尔 (Howard S. Becker) 以标签互动视角对大麻使用者越轨生涯的研究, 到霍华德·帕克 (Howard Parker) 对后现代社会娱乐性毒品使用正常化的研究, 犯罪学各个理论学派对毒品滥用问题的关注从未间断(Becker, 1963; Parker, Aldridge, & Measham, 1998)。面对中国日渐严峻的新型毒品滥用形势, 诸多学者也对吸毒者群体以及有效的戒毒康复措施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收稿日期: 2021-04-21

作者简介: 张韵然,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研究员; 刘建宏, 澳门大学社会学系特聘教授; 钟华,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例如,李质彬等,2011;林少真,2012;王增珍等,2004)。然而,即使探讨毒品滥用及相关禁毒政策的文献浩如烟海,基于犯罪学理论视角对毒品滥用进行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例如李劲华,陈静宜,罗志坚,2013;Cheung & Cheung,2006,2018;Zhang,Liu,& Huang,2013)。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由多种原因所致。首先,从一般人群中锁定吸毒者是相当困难的,要进行吸毒者的研究往往要进入强制戒毒所或者社区戒毒机构。但是出于安全和保密因素,取得这两类机构研究的许可是比较困难的。其次,犯罪学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很多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在学界并未得到广泛普及和应用,因此大规模的理论验证工作便较难开展(靳高风,2006)。

过去的研究表明,男性与女性的吸毒行为有诸多不同之处,例如男性往往通过朋友接触到毒品,而女性吸毒者通常经由她们的男性吸毒伴侣才接触到毒品(Hoda,Kerr, Montaner,& Wood,2008;Liu,Hsiao,& Kaplan,2016)。然而,与传统毒品使用者相比,新型毒品使用者当中女性所占比例明显增加,是否同样是由于受到男性吸毒伴侣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由于吸毒者中女性占比远低于男性,所以大多数对吸毒者的定量研究以男性样本为主,以女性吸毒者为样本的定量研究较少。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以中国某女性强制戒毒所的学员为研究对象,基于三大犯罪学传统理论,即社会控制理论、差别接触理论及娱乐性毒品使用“正常化”理论,试图描述和呈现她们吸毒行为的大致模式、探讨影响其行为模式的社会因素以及提出相关可行性建议。

一、对女性吸毒行为的犯罪学理论解释

(一)社会控制理论

与试图去解释人们“为何犯罪”的其他传统犯罪学理论不同,社会控制理论关注的是人们“为何不犯罪”。社会控制理论的主要论点是“当个人与社会的连结过于薄弱或破裂时,就可能会从事违法犯罪行为”(Hirschi,1969)。与社会中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连结可以有效防止犯罪与越轨行为的发生,这种连结通常包含四个方面:

1. 依恋(attachment),即个体对父母、学校和同辈朋友的感情依恋,这种感情依恋越强烈,人就越不可能犯罪。
2. 追求(commitment),即个体对传统的生活目标的追求,人若渴望获得为社会承认的传统的成功,就不可能冒损害自己前途的危险去违法犯罪。
3. 参与(involvement),即参加传统的活动,如学术活动、体育运动等,人若用更多时间和精力参与传统活动,就不可能进行违法犯罪行为。
4. 信仰(belief),即对社会的道德、法律规范等的尊重,人若尊重道德与法律规范,就不会出现违反这些规范的行为(Hirschi,1969)。

在实证研究中最常使用的量度便是对重要他人的依恋,人们因为在乎重要他人对自己的期望,所以不会做违法犯罪的事情让他们失望(Akers & Sellers,2013)。例如 Becoa, Elena, Amador, & Ramón(2014)的研究发现,父母之间有力的连结与青少年对物质滥用行为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似研究请见 Snyder, Gwaltney, & Landeck, 2015)。另外, Tyas & Pederson(1998)同样发现与父母之间较弱的依恋关系与青少年群体的吸烟行为有高度相关。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Kostelecky(2005)发现与父母之间的较弱的依恋关系会让孩子更多地与酒精、大麻及其他药品接触。

在人际交往当中,男性多以目标导向为主,而女性更倾向于关系导向(relation-oriented),女性的这种特质使她们对与重要他人的连结更为敏感、更易受到这种连结的影响(Steffensmeier & Allan,1996)。因此,对女性来说,与重要他人的连结应该更能够阻止她们参与到违法犯罪行为中。例如,Heimer and Coster(1999)的研究证明,与重要他人的连结(尤其是情感联结)能够有效阻止女孩子习得一些支持犯罪与越轨行为的观念,但是对男孩子的效果却不甚明显。在中国 Liu et al.(2016),曾就女性吸毒者群体进行访谈,发现相当多的女性吸毒者缺少与重要他人的连结。她们当中相当一部分家庭结构不健全或者缺少父母教养和关怀,而除去毒品可以带来的欣慰和快感,在“毒品世界”里与毒友的连结还能使她们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她们很容易反反复复沉迷于毒品世界(Liu et al.,2016)。

(二)差别接触理论

作为最重要的犯罪学理论之一,差别接触理论提出,犯罪与越轨行为的习得和延续是在与犯罪或者越轨同伴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Sutherland, Cressey & Luckenbill,1992)。人们在与犯罪与越轨行为的同伴互动的过程中,会从他们那里接触到对违法犯罪持正面态度的观念,进而可能模仿和追随同伴的越轨行为,并且在之后的生活当中进行重复,最终习得违法犯罪行为。

对差别接触理论相关文献的 Meta 分析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表明,与越轨同伴的差别接触对违法犯罪行为有相当强的影响(Pratt et al.,2010)。在对物质滥用行为的研究中,同样有大量研究证明:与越轨同伴交往甚至主观上认为周围有越轨同伴,都对其吸烟、酗酒以及滥用其他药物行为有显著和持久的影响。D'Amico 和 McCarthy(2006)的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调查了 974 名中学生的物质滥用情况 and 他们对周围同伴越轨情况的主观感知,结果表明,在控制先前个人物质滥用频率的前提下,他们先前在主观上认为自己周围有较多酗酒的同伴与后期他们自己的吸烟和吸大麻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华人社会中,Cheung 和 Cheung(2008)在中国香港青少年群体当中所做的研究同样发现,在控制其他因变量的前提下,青少年身边越轨同伴数目与其是否有越轨行为(包括逃学、吸烟、频繁饮酒和赌博等六项越轨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对于犯罪与越轨行为中的性别差异,一些研究发现,虽然男女都可能被被同辈影响,但在受影响程度以及机制上是较为不同的(Haynie, Doogan, & Soller,2014; Mears, Ploeger, & Warr,1998; Weerman & Hoeve,2012)。具体到女性吸毒方面的研究,目前学界对此并没有一致的结论。首先,Mears 等(1998)分析了全国青少年调查(National Youth Survey)中有关越轨行为的自我报告数据,发现女性对自己有较高的道德要求,而这显著减少甚至消除了越轨同伴对她们造成的影响。因此,与越轨同伴的接触并不是影响她们越轨行为的重要因素。其次,Liu 和 Kaplan(1999)对 2,753 名青少年的纵向研究发现,相对于男性青少年,女性较少与越轨同伴接触或者接触频率较低,因此也较少受其影响。然而,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发现,女性的越轨行为通常是与通过与越轨男性(尤其是亲密伴侣或者较为年长的男性)接触和相处习得的(Giordano,1978; Liu et al.,2016; Stattin & Magnusson,1990; Warr,1996; Zimmerman & Messner,2010)。有关中国女性吸毒者的研究也发现,她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处于高风险社交网络中,她们有吸毒习惯的朋友带她们接触到毒品并教她们如何维持吸毒习惯(Liang, Lu, & Taylor,2009; Liu et al.,2016)。

(三)正常化理论

“正常化”的概念最先是用来描述被边缘化或污名化的个体逐渐被主流社会接纳并

且成为主流社会一部分的过程 Wolfensberger, Nirje, Olshansky, Perske, and Roos。在“正常化”的过程中,他们曾经不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越轨行为会被接纳甚至会在主流社会流行,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人们对女性吸烟行为认知的转变过程。起初女性吸烟行为被认为是一种不检点的行为(越轨行为),后来渐渐被“正常化”和去污名化;在一部分欧洲国家,男女吸烟者在数目上几乎相当,女性吸烟现象非常普遍,大家早已习以为常(EMCDDA & ESPAD, 2016)。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在派对和夜总会中使用摇头丸和氯胺酮等娱乐性毒品(Joe Laidler, 2005)。这些新型毒品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部分开始流行,折射出年轻人对当下“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的恐惧(Beck, 1992)。面对教育和就业压力,年轻人在毒品作用下可以暂时逃避压力和现实,享受稍纵即逝的快感。最重要的是,因为新型毒品的成瘾性较低,所以在他们看来,这种逃避和享受的风险是很低的。久而久之,适量使用新型毒品“助兴”、将这种行为当成个人选择并且愿意为此承担有限的风险,已成了这些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Beck, 1992; Cheung & Cheung, 2006; Parker, Williams, & Aldridge, 2002)。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 Parker 等人(1998)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娱乐性)毒品使用的“正常化”理论。

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提高以及女性本身自主性的觉醒使得原本由男性主宰的世界渐渐出现女性的身影。这种现象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劳动力市场、政治参与,犯罪与越轨领域也概莫能外(Adler, 1975)。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女性使用冰毒和摇头丸等新型毒品的问题(Measham, 2002)。一些学者采用性别研究的视角来探讨西方和东方社会中的女性吸毒问题(例如, Cheung & Cheung, 2018; Measham, 2002)。在这些文献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女性在经济上日渐独立,她们的自主性也越来越强。因此,她们不再依靠自己的男性伴侣,开始自己主动找乐子和探索休闲娱乐的活动(Measham, 2002)。这种现象也同样出现在经济高速发展、性别日益平等的中国。例如,一部分研究发现,女性吸毒目的是为了应对空虚和追求快感。在访谈过程中她们往往否认自己上瘾,她们常常强调自己对毒品是有控制感的,即“我想吸就吸”(孙宝华, 2013; 王洁心, 2008; 姚建龙, 2001; 赵冬等, 2003)。所以吸毒对于她们来说,只是一种“以娱乐为目的、风险可控的个人选择”(Liangetal., 2009; Liuetal., 2016)。

(四)本研究的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假设 1:女性吸毒者与重要他人(包括家人、亲戚朋友等)的连结越紧密,吸毒频率越低。假设 2:女性吸毒者拥有的吸毒朋友的数量越少,吸毒频率越低。假设 3:以娱乐、消除空虚、打发时间等为目的使用毒品的女性吸毒者吸毒频率显著低于因其他目的使用毒品的女性吸毒者的吸毒频率。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研究程序

本研究选取中国东部某省的女性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学员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统一在戒毒所安静的教室内完成。戒毒学员有序落座,由研究者发放问卷,宣读研究介绍、问卷答题要求及知情同意书等,之后进行独立作答。作答过程中,如果学员对问卷题目要求或者内容有任何疑问,可单独提问,由在场研究者负责解释。所有学员

问卷作答完毕后,当场回收调查问卷,每份问卷平均作答时间为 30 分钟。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288 份,回收 286 份,剔除含有缺失值的无效问卷后,最终对 155 份问卷进行了回归分析。这 155 名女性戒毒学员的年龄范围为 18 至 54 岁,平均年龄为 29.64 岁,其中有吸烟习惯的占 83%,有饮酒习惯的占 62%。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戒毒学员在进入戒毒所之前成瘾最严重时期的吸毒频率。自变量包括:1. 与重要他人的连结由“你在戒毒所期间谁来看过你(包括家人、其他人、没有人)”测量;2. 与吸毒朋友的接触由“你有多少个吸毒的朋友(没有、很少、有一些、很多)”测量;3. 与毒品使用正常化相关的态度由“你是否使用娱乐性毒品(k 粉、摇头丸等)”和“你因为何种原因吸毒(好奇、娱乐、填补空虚、消除烦恼)”测量。同时,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教育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吸烟习惯、饮酒习惯以及开始吸毒后多久没钱买毒品。

(三)数据分析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 155 名女性戒毒学员的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由 STATA14.0 软件进行管理和回归分析。

(四)结果

表1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量度	范围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吸毒频率(每周)	1~56	16.04	11.18
自变量			
没有人/家人/其他人探望	1~3	2.08	0.46
吸毒朋友数量	1~4	2.98	0.99
是否使用娱乐性药物	0, 1	0.79	0.41
吸毒目的	0, 1	0.43	0.50
控制变量			
年龄	18~54	29.64	8.45
教育背景	1~11	3.79	1.73
社会经济地位	1~10	4.32	2.47
抽烟习惯	1~3	2.71	0.68
饮酒习惯	1~3	2.26	0.96
吸毒之后多久没钱	1~7	5.69	1.81

表 1 列出了所有变量的情况。其中因变量,参与调查的女性戒毒学员在进入戒毒所之前的吸毒频率的范围为每周 1 次~56 次,均值为每周 16 次。自变量社会连结得分均值为 2.08;其次,吸毒朋友的数量均值为 2.98,说明参与调查的女学员有一些吸毒朋友的情况较为多见;最后,79%参与调查者使用娱乐性药物,43%吸毒目的是为了娱乐,其中 83%有吸烟习惯,62%有饮酒习惯。

表 2 显示了 OLS 回归模型的结果。模型 1 是没有独立变量的基准模型,该模型显示:年龄、吸烟习惯、饮酒习惯和经济状况与吸毒频率显著相关。年龄较大受访者的吸毒频率显著高于年轻者吸毒频率($\beta=0.267, p<0.05$),从不吸烟的人吸毒频率显著高于现在或者之前有吸烟习惯的人($\beta=-4.248, p<0.05$),从不饮酒的人吸毒频率显著高于现在或者之前有饮酒

习惯的人($\beta=-2.102, p<0.1$),财务状况较好的人吸毒频率显著高于较差的人($\beta=1.365, p<0.01$)。在模型 2 中,与文献综述预期一致,家人($\beta=-10.05, p<0.05$)或者其他人($\beta=-8.824, p<0.1$)来探望都能显著影响女性吸毒者的吸毒频率,有这两类重要他人来探望的学员相对于无人来探望的学员都有明显较低的吸毒频率。在模型 3 中,学员吸毒朋友的数量与吸毒频率没有显著相关。在模型 4 中,使用娱乐性药物与药物使用频率显著相关,即使用娱乐性药物使用者的吸毒频率显著低于其他毒品使用者($\beta=-10.83, p<0.01$)。

表2 OLS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与重要他人的联结					
家人探望		-10.05** (3.837)			-11.11*** (3.663)
其他人探望		-8.824* (4.652)			-9.734** (4.424)
差别接触					
吸毒朋友数量			-0.104 (1.053)		-0.409 (0.936)
正常化					
是否使用娱乐性 药物				-10.83*** (1.907)	-11.11*** (1.885)
吸毒目的				1.135 (1.921)	2.035 (1.917)
控制变量					
年龄	0.267** (0.119)	0.246** (0.120)	0.279** (0.123)	0.234** (0.111)	0.227** (0.113)
教育背景	0.161 (0.574)	0.0708 (0.567)	0.160 (0.589)	0.144 (0.528)	0.0785 (0.527)
社会经济地位	0.505 (0.405)	0.529 (0.398)	0.540 (0.417)	0.518 (0.375)	0.590 (0.371)
抽烟习惯	-4.248** (1.623)	-4.575*** (1.597)	-4.279** (1.658)	-4.699*** (1.475)	-5.299*** (1.456)
饮酒习惯	-2.102* (1.135)	-2.361** (1.117)	-2.065* (1.180)	-1.559 (1.082)	-1.696 (1.074)
吸毒之后多久开 始没钱购买毒品	1.365*** (0.517)	1.355*** (0.507)	1.403** (0.538)	1.110** (0.508)	1.096** (0.508)
常量	-11.39* (6.480)	-2.023 (7.481)	13.57* (7.814)	-2.339 (6.239)	35.87*** (8.450)
R 平方	0.167	0.216	0.169	0.376	0.443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在模型 5 中,所有的自变量都纳入分析模型,结果显示,与模型 2 相比,社会控制理论的量度与吸毒频率显著相关($\beta=-11.11, p<0.01, \beta=-9.734, p<0.05$)。与模型 3 分析结果类似,受访者吸毒朋友的数量与吸毒频率仍然没有显著相关。同时,与模型 4 相比,测量正常化的指标之一,即是否使用娱乐性药物仍然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即与吸毒频率显著相关($\beta=-11.88, p<0.01$)。三个控制变量与药物使用频率显著相关,包括年龄、吸烟习惯和财务状况,即年龄较大的受访者($\beta=0.227, p<0.05$)、从不抽烟的人($\beta=-5.299, p<0.01$)以及有更好的经济状况的人($\beta=1.096, p<0.05$)往往有更高的吸毒频率。此外,模型 5 的 R-square 为 0.443,表明该模型在样本的吸毒频率高低方面具有非常好的解释力。

三、分析和讨论

根据从中国沿海省份女性强制隔离戒毒所收集的数据,本研究基于犯罪学理论分析了影响女性吸毒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与重要他人的连结强度与女性吸毒频率呈显著负相关,使用娱乐性药物的吸毒者相对于其他吸毒者有更低的吸毒频率。

本研究结果支持与社会控制理论相关的假设。在模型 2 和模型 5 中,与无人探访的学员相比,有家人或者其他人来探访的女性吸毒者的吸毒频率较前者显著要低。这与现有文献提供的研究结论是基本一致的,即与重要他人之间的连结可以有效影响女性药物滥用行为(Kostelecky, 2005; Snyder et al., 2015; Tyas & Pederson, 1998)。在中国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被他们所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影响和控制,这种压力和控制主要来自于家庭成员(Cheung & Cheung, 2006)。此外,我们的社会常常鼓励甚至要求女性去扮演建立和维护关系的角色以及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Steffensmeier & Allan, 1996)。在中国社会,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吸毒仍然是一种被严重污名化的行为。为了履行其作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或者乖女儿的性别角色,满足大家对自己的期望,中国女性往往会牺牲更多个人追求来保护家庭以及维持这些已有的情感纽带,因此这些关系因素对女性行为的影响或许更大(Lo & Zhong, 2006; Rountree & Warner, 1999)。

在对差别接触理论的检验中,模型 3 或模型 5 中没有一个指标与女性的药物使用频率显著相关,这或许表明女性在吸毒时更具独立性。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使得自由意志和个人经历在年轻都市人的选择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受外部影响的影响较小。换句话说,对于今天的中国女性来说,吸毒同伴没有像以前那样具有影响力(Lin & Zhang, 2014)。同时,一项探究中国吸毒者对冰毒危害的主观感知的研究发现,受访者常常提及“他们关注药品的成瘾性,不会接触高成瘾性的毒品”(Kelly et al., 2014)。研究中国冰毒使用者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使用者(69%)表示他们不相信吸冰毒会导致成瘾。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年轻的合成吸毒者将吸毒作为“风险可控”的理性娱乐选择,或许就可以理解了(Kelly et al., 2014)。

对于本研究检验的正常化理论,那些使用娱乐性毒品的人吸毒频率较低,因为娱乐性药物多为新型毒品,这种毒品的身体成瘾性要远低于海洛因等传统毒品(Nutt, King, & Phillips, 2010)。与吸食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吸毒者相比,新型毒品使用者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定时使用毒品以防止戒断反应出现(Kelly et al., 2014)。因此,他们容易自我感觉对毒品尚有控制感,而不是完全由毒品控制。然而,中国文化较西方文化对吸毒行为的污名化更为严重,对于生活在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中国人来说,吸毒并不仅仅是基于自由意志、追求快乐幸福的个人选择,而是一种为家人所不齿、为社会所唾弃的行为。尽管近一半的受访者(43%)表明他们吸毒是为了娱乐,但该指标与其吸毒频率并无显著相关。

基于本研究结果,戒毒康复工作者在日后可考虑更多关注女性吸毒者的重要社会连结,包括与家人、亲密伴侣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协助她们在戒毒康复的过程中建立、修复或者改善支持性社会关系,以帮助她们更好地戒断和重归社会。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否吸毒是个人选择,而且毒品危害是可控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去探索毒品对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为制定更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智力支持。

四、本研究的局限和展望

因为这项研究是在女性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的,受抽样方法和样本量的限制,目前

的研究结论不能在更广泛的研究群体当中推广。

这里使用的正常化理论的测量指标可能不足以呈现理论的每个方面。未来研究应该采纳更加全面和严谨的测量指标,例如,最好可以测量该理论的五个关键维度,即娱乐性药物的可得性、尝试吸毒、持续吸毒、对娱乐性药物使用的宽容态度和文化接纳(Parker et al., 2002)。

犯罪与越轨行为中的性别差异在犯罪学研究中始终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如果以后的研究可以同时招募男性和女性吸毒者作为研究对象,这在解释吸毒行为的性别差异方面将会非常有力。因此,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对中国的物质滥用进行性别差异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靳高风:《论中国犯罪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以社会科学发展与西方犯罪学学科建设为视角》,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 [2] 李劲华,陈静宜,罗志坚:《吸毒“正常化”与香港防毒品政策之转变——以青少年吸食氯胺酮为例》,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 [3] 李质彬,袁颖,杜江,江海峰,赵敏:《海洛因依赖者冲动特征及性别差异的比较分析》,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年第6期。
 - [4] 林少真:《“我吸的是冰,不是海洛因”:比较视野下的吸毒者自我表达——以上海市新型毒品使用者为例》,载《前沿》2010年第1期。
 - [5] 林少真:《多元话语视角下的毒品成瘾问题分析》,载《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 [6] 孙宝华:《女性吸毒心理原因探析》,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 [7] 王洁心,谢文婷,李婷,朱婉儿:《海洛因依赖者心理压力、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载《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8年第2期。
 - [8] 王增珍,凌秀凤,姜东林,孙家富,程艺萍,刘菊香,湛娇娥:《吸毒人员戒毒效果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载《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4年第1期。
 - [9] 姚建龙:《对女性吸毒问题的探讨》,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6期。
 - [10] 赵冬,赵成正,刘彦红,安玉泉,刘志民:《我国的药物滥用与艾滋病现状》,载《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3年第4期。
 - [11] 赵子慧,王晓丹,达勇,张龙:《女性吸毒人员的吸毒因素、社会化状况及应对措施》,载《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5年第2期。
 - [12]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2004年度中国禁毒报告》。
 - [13]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2017年度中国禁毒报告》。
- Adler, F. (1975). *Sisters in crime: The rise of the new female criminal*. McGraw-Hill.
- Becker Howard, S. (1963).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 Akers, R. L., & Sellers, C. S. (2013). *Criminological theories: Introduction,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6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 Beco?a, I. E., del Elena, F., Amador, C., & Ramón, F. H. J. (2014). Attachment and substance use in adolescence: a review of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aspects. *Adicciones*, 26(1).
- Cheung, N. W., & Cheung, Y. W. (2006). Is Hong Kong experiencing normalization of adolescent drug us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ormalization thesis. *Substance use & misuse*, 41(14).
- Cheung, N. W., & Cheung, Y. W. (2008). Self-control, social factors, and delinquency: A test of the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among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7(4).

- Cheung, Y. W., & Cheung, N. W. T. (2018). *Psychoactive Drug Abuse in Hong Kong, Quality of Life in Asia* 11. Springer.
- D'Amico, E. J., & McCarthy, D. M. (2006). Escalation and initiation of younger adolescents' substance use: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peer use.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39(4).
- EMCDDA & ESPAD (2016). *ESPAD Report 2015 – Results from the European School Survey Project on Alcohol and Other Drugs*, EMCDDA –ESPAD joint publications,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 Giordano, P. C. (1978). Girls, guys and gangs: The changing social context of female delinquency.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 Criminology*, 69.
- Haynie, D. L., Doogan, N. J., & Soller, B. (2014). Gender, friendship networks, and delinquency: A dynamic network approach. *Criminology*, 52(4).
- Heimer, K., & Coster, S. D. (1999). The gendering of violent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37(2).
- Hirschi, T.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Hoda, Z., Kerr, T., Montaner, J. S., & Wood, E. (2008).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jugular injections among injection drug users. *Drug and Alcohol Review*, 27(4).
- Huang, K., Zhang, L., & Liu, J. (2011). Drug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profile of Chinese drug users in a metropolitan a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22(2).
- Joe Laidler, K. A. (2005). The rise of club drugs in a heroin society: the case of Hong Kong. *Substance use & misuse*, 40(9–10).
- Kelly, B. C., Liu, T., Yang, X. Y., Zhang, G., Hao, W., & Wang, J. (2014). Perceived risk of methamphetamine among Chinese methamphetamine us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25(6).
- Kostelecky, K. L. (2005). Parental attachm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life eve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alcohol and drug use during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8(5).
- Liang, B., Lu, H., & Taylor, M. (2009). Female drug abusers, narcotics offenders, and legal punish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7(2).
- Lin, S., & Zhang, Y. A. (2014). Risk control and rational recreation: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synthetic drug use among young urbanit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25(4).
- Liu, L., Hsiao, S. C., & Kaplan, C. (2016). Drug Initiation of Female Detainees in a Compulsory Drug Treatment Institu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s*, 48(5).
- Liu, X., & Kaplan, H. B. (1999). Explaining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adolescent delinquent behavior: A longitudinal test of mediating mechanisms research note. *Criminology*, 37.
- Lo, C. C., & Zhong, H. (2006). Linking crime rates to relationship factors: The use of gender-specific data.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4(3).
- Mears, D. P., Ploeger, M., & Warr, M. (1998). Explaining the gender gap in delinquency: Peer influence and moral evaluations of behavior.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5(3).
- Measham, F. (2002). "Doing gender" – "doing drugs": Conceptualizing the gendering of drugs cultures. *Contemporary drug problems*, 29(2).
- Nutt, D. J., King, L. A., & Phillips, L. D. (2010). Drug harms in the UK: a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The Lancet*, 376(9752).
- Parker, H., Aldridge, J., & Measham, F. (1998). *Illegal leisure: The normalization of adolescent recreational drug use*. Psychology Press.

Parker, H., Williams, L., & Aldridge, J. (2002). The Normalization of ‘Sensible’ Recreational Drug Use Further Evidence from the North West England Longitudinal Study. *Sociology*, 36 (4).

Pratt, T. C., Cullen, F. T., Sellers, C. S., Thomas Winfree, L., Madensen, T. D., Daigle, L. E., & Gau, J. M. (2010).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 meta-analysis. *Justice Quarterly*, 27(6).

Pratt, T. C., Cullen, F. T., Sellers, C. S., Thomas Winfree, L., Madensen, T. D., Daigle, L. E., & Gau, J. M. (2010).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 meta-analysis. *Justice Quarterly*, 27(6).

Rountree, P. W., & Warner, B. D. (1999). Social ties and crime: Is the relationship gendered? *Criminology*, 37(4).

SCMP. (2017). China’s synthetic drug problem growing, government says. SCMP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082474/chinas-synthetic-drug-problem-growing-government-says>.

Snyder, S. M., Gwaltney, A. Y., & Landeck, E. (2015). What Social Bonds have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Patterns of Substance Use among Child-Welfare-Involved Youth? *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s*, 47(4).

Stattin, H., & Magnusson, D. (1990). Pubertal maturation in female development.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Steffensmeier, D., & Allan, E. (1996). Gender and crime: Toward a gendered theory of female offend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1).

Sutherland, E. H., Cressey, D. R., & Luckenbill, D. F. (1992). *Principles of criminology*. Rowman & Littlefield.

Tyas, S. L., & Pederson, L. L. (1998). Psychosocial factors related to adolescent smoking: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obacco Control*, 7.

Warr, M. (1996). Organization and instigation in delinquent groups. *Criminology*, 34(1).

Weerman, F. M., & Hoeve, M. (2012). Peers and delinquency among girls and boys: Are sex differences in delinquency explained by peer fac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9 (3).

Wolfensberger, W. P., Nirje, B., Olshansky, S., Perske, R., & Roos, P. (1972). *The principle of normalization in human services*. Toronto: National Institute on Mental Retardation.

Zhang, L., Liu, J., & Huang, K. (201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lapsed drug users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8(3).

Zimmerman, G. M., & Messner, S. F. (2010). Neighborhood context and the gender gap in adolescent violent cri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6).

(责任编辑:刘 旻)